

魯迅的道路

胡繩等著

魯迅的道路



魯迅的道路

著作者 胡 繩 等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總經售 香港生活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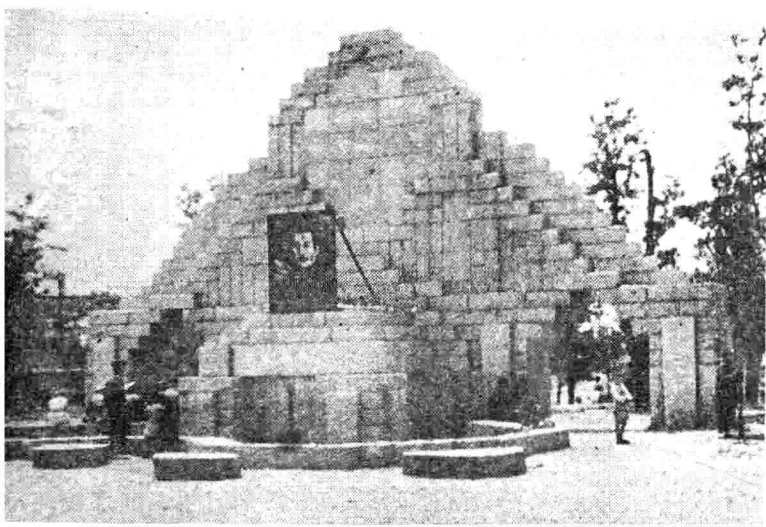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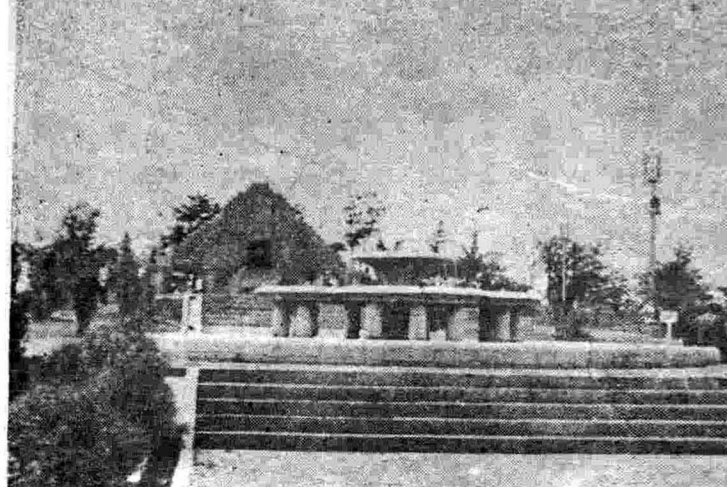
大連市魯迅公園

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蘇聯紅軍解放大連市，在市內建立魯迅公園紀念我國偉大文豪魯迅先生。茲刊園景四幅以饗讀者。

公園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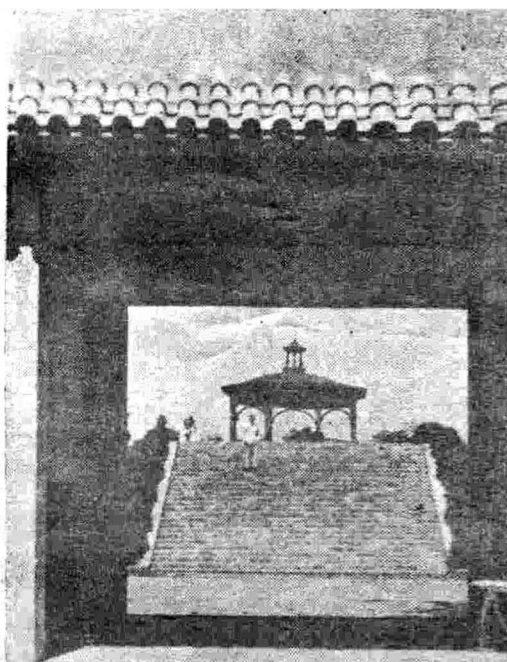
魯迅先生紀念碑





紀念碑前之圓形石壇

莊嚴之圓亭前景



目次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胡繩 (五)
論馬恩的文藝批評	荃麟 (二一)

*

敬悼朱自清先生	同人 (四七)
---------	---------

評「蝦球傳」第一二部	周鋼鳴 (五五)
------------	----------

羅曼羅蘭的「搏鬥」	力夫 (六三)
-----------	---------

*

催糧差	趙樹理 (七九)
-----	----------

瞎老媽	洪林 (八七)
-----	---------

在後方勤務站	健羣 (九九)
--------	---------

*

致家鄉	鄒荻帆 (一〇五)
-----	-----------

小王五	劉衍洲 (一一一)
-----	-----------

我有好主意.....字金生（九八）

訴苦.....白小保（九八）

短工.....衡水（九八）

武池村農民的詩.....適安輯（八六）

算盤子·找着根

*

實在的故事

徵實.....李平潮（一一七）

檢查哨.....陸泉（一一八）

一百廿九處傷.....白艾（一二〇）

肥料事件.....子殷（一二四）

*

魯迅公園（照片）

編後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胡繩

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所作「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的分析，至今仍應承認爲對魯迅思想發展道路的最好的說明。『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這就是瞿秋白分析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所達到的結論。

如果不從魯迅思想發展的全部過程上來看，就不可能懂得，爲什麼『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四年（一九〇七年），二十七歲的時候，在日本，開始用文字表現其社會思想。這時正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期，革命運動的中心就在日本的留學生界中。魯迅是歡迎這個爲祖國求進步，求改造的革命運動的，而且還參加過當時的革命團體之一。他當時的思想受着周圍的革命運動的影響，但又在某些方面表現得比別的人看得更遠，看得更深。

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能使他滿足，在辛亥革命前，魯迅天才地預感到這個革命將不能真正達到改造故國的目的：『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何與焉。』（文化偏至論，一九〇七年）

辛亥革命時，魯迅已回國，他雖也興奮地接待這個變革，但他立刻看出，這革命是假的。『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爲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范

民國初年的混亂的中國對於魯迅是個鍛鍊，但這幾年間，他的思想發展極少被用文字表現出來。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夜——從一九一八年起，魯迅的戰鬥的光芒才開始輝煌地展開了。

『魯迅在五卅前的思想，進化論和個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固然這種個性主義，是一般的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性的幻想，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城市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爲鉅大的自覺的政治力量，而農村的農民羣衆只有自發的反抗鬥爭。大部分的市儈和守舊的庸人，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障礙。爲着要光明，爲着要征服自然界和舊社會的盲目力量，這種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瞿秋白）

魯迅之『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固然是到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風暴以後，才澈底地完成，但是五四運動後十年間，對於魯迅，正是循着這個方向而從事着艱苦卓絕的鬥爭的歷程。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毛著「新民主主義論」）

魯迅在五卅運動中，是作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而出現的，與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有着明顯的區別，在文化革命戰線上表現了高度的澈底性，不妥協性。尤其重要的是，到了五四運動的一二年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的大部份，已陸續與敵人妥協站向反動方面去了，而魯迅却繼續勇敢而堅決地保持和發展着他的文化革命陣地。

固然在五卅後若干年間，魯迅並沒有直接走向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他只是堅決在反動勢力的大本營——北京城裏，向軍閥官僚和他們的叭兒狗（包括着叛變了五四運動的「正人君子」們），作着短兵相接的戰鬥。雖然在主觀上他有時自己說是在作着「絕望的抗戰」，「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但在客觀上，他正是擔任了當時整個人民革命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戰線。

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在這時期已經湧現為獨立的力量，但在文化思想上還沒有能建立堅強的陣地。魯迅在文化戰線上是獨立地堅持着他的工作的，通過他的直感的生活經驗而把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鬥爭進行得如此澈底，可算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在那樣的環境下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度了。應該承認，在這些年頭中，魯迅已經因他的戰鬥業績表現出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表現出他『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定、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作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魯迅是有着他的特點的。瞿秋白說：『他不但很早就研究過自然科學和當時科學上的最高發展階段，而且他和農民羣衆有比較鞏固的聯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羣裡，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種「野獸性」。他真能斬斷「過去」的葛籐，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族的宮殿。……』

革命的知識份子，如果敢於並且能夠和封建勢力斬斷關係，和帝國主義斬斷關係，並且和一切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鬥爭中退却變節的資產階級堅決對立起來，勇敢堅定地向前奮鬥，那麼他終究要發現，他的道路只能也必須和無產階級的道路緊相連接起來。——這是近代中國文化革命發展上的一個規律。魯迅是在真實意義上完成這樣的發展的一個最偉大的先驅者。

就這意義說，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無產階級之間確是並沒有隔開一座萬里長城。但就另一方面說，從前者的立場轉向後者（除非是虛偽的「做戲式」的「轉變」）畢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一個嚴肅的自我

改造的過程。魯迅正是在真實意義上完成這樣的過程的一個最光輝的模範。用瞿秋白的說法，就是：『從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

以爲革命知識分子本來就在人民大眾中，所以用不着有什麼自我改造的想法是和魯迅的道路一點也沒有相似之處的。抱着這樣見解的人就不能不否定瞿秋白下面一段分析，說：「恐怕也未必對的」罷（舒蕪）

瞿秋白在這點上的分析是十分正確的。他指出，魯迅作品雖然曾經只是憎惡舊社會而不能標明社會發展的方向，但這仍不失爲革命文學。『因爲牠至少還能够反映社會眞象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應當注意的方向』。『而同時，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够離開個性主義——懷疑羣衆的傾向的。他們看得見羣衆——農民小私有者羣衆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的笨拙的守舊口號背後隱藏着的革命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里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革命失敗的一些失望和悲觀。』

進化論與個性主義，對於魯迅固然曾經是戰鬥武器，但也曾經是障礙前進的一種負累。就這方面說，魯迅的偉大正在於他能够通過苦痛的歷程，表現了嚴肅的自我獻身的精神，而終於克服了，拋開了這種負累。



一九〇七年魯迅作「文化偏至論」，揭出他當時的思想綱領是：『重個人，輕物質』。（「摭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這就是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基礎。

那時的魯迅認爲，十九世紀的歐洲文明的流弊是個人被集體所抹煞，主觀精神被物質生活所淹沒；而糾正這種弊病的就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創的「新」思潮，這所謂「新」思想却是以「個人主義」與「非物質主義」爲標幟的。根據尼采的「超人」的思想，「文化偏至論」中說：『是非不可公於衆，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衆，公之則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與其抑英哲以就凡

庸，曷若置衆人而希英哲？則多數之說，繆不中經，簡性之尊，所當張大，蓋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慮而可知矣。雖然，此亦賴夫勇猛無畏之人，獨立自強，去離塵垢，排輿言而弗淪於俗囿者也。」同樣的，這時候的魯迅認爲唯物論思想足以造成『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的結果，因此必須靠『主觀與意力主義之興』以挽救這種『唯物極端』的流弊，也是受了尼采主義的影響。

很明白的，魯迅這時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是一種錯覺。他把歐洲資產階級文明墮落時期的反動思潮看做了是新生的代表，以致以爲二十世紀的文明將在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基礎上振興；『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寢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遷，簡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開生路者也。』

但魯迅之在一九〇七年在「文化論至論」以及「摩羅詩力說」等文中提出這樣的思想，並不只是「介紹」外國思想，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來接觸了當時中國的問題。自從辛丑和約（一九〇一年）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沸騰着求革新的熱潮。但老一輩的改良主義者只希望政治「維新」，建立君主立憲，以達到振興工業，求臻「富強」的目的；新一輩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的革命主義者中只以爲拋兩個炸彈，搞幾次起義暴動，把滿清朝廷推翻，爲故國換上民主立憲的招牌，就可以成功了。魯迅天才地感到這一切並不濟事。但究竟應該怎樣辦呢？魯迅這時候不可能提出集體主義的思想，因爲在當時中國還沒有掀起勞動人民中的自覺的羣衆鬥爭，而他們能看到的却只是『大部分守舊的市儈和守舊的庸衆，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阻礙』（瞿秋白語）。他這時候更不可能用科學的方法來看出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而只能根據直覺的經驗體認到封建文化的傳統重壓是在中國民族向前進步的途中必

須用巨大力量來掙脫的束縛。——用個人的自覺力量擊退傳統的重壓，在守舊和虛偽的「庸衆」中保持個性的發揚是魯迅當時所可能到達的戰鬥方針。因此，歐洲資產階級沒落中的反動思想，轉過來却成了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啓蒙思想者開始他的向前追求的武器了。

應該說，提出「重個人，輕物質」的思想，對於五四運動前的魯迅並不是到達了一個思想結論，而恰恰是他在昏沉的子夜開始他的思想追求的長途的發端。在五四運動前，提出類似思想的人除魯迅外並不是絕無第二人，但能够堅持思想的追求，以致終於克服和揚棄了這個發端的却幾乎可以說，只有魯迅一人。

因此，很明白的，在四十年前，魯迅在唯心論與個人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片面地提出發展個性，加強主觀力量的主張，「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但在四十年後，胡風，舒蕪諸先生企圖用新的字眼來複寫在實質上與「文化偏至論」中的內容相同的思想，其客觀的趨向却只能是小資產階級對於人民大眾的自覺的，集體的進取和改革的抵制。



『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裏逐步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衆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已經披上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這個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六的時候，却已經準備着。只要看當時段祺瑞章士釗的走狗「現代評論」派，在一九一七年之後是怎樣的得其所哉，就可知道這中間的奧妙。而魯迅當時的「語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正是針對着那些末來的「官場學者」的。』（瞿秋白）

在這一「偉大的分裂」中，魯迅的立場是很鮮明的：他和虐殺人民的任何舊的，新的統治者沒有一絲一毫的妥協。他向一切披着「正人君子」面目的奴才幫兇宣戰，他也無情地揭發一切掛着「革命者」斜皮帶的劊子手的面目。

但魯迅直至大革命時期還沒有完全擺脫進化論與個性論的思想基礎——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對於他的思想的負累。

進化論的思想使得他這時還不能明確地從階級觀點出發分析一切問題，雖然他從實際生活出發的最高的憎恨與打擊是向着統治階級的。「熱風」的隨感錄第四十八則中說：『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延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這固然還是在五四運動前一年（一九一八年）所寫下來的話，在五四後魯迅自己經歷了的激烈的思想鬥爭，不能不漸次修正這種和平的進化觀念，但以這樣的看法發展到明確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却決不是簡單地一躍而至的。

進化論思想加上個性論觀點又使得他不會發生『懷疑羣衆的傾向』。例如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在和人通訊中曾這樣說：『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華蓋集）照魯迅這時的想法，仍覺在「民衆」中談改革是「很難」的，因此『只好以智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衆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歷史通知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簾，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同上）這很分明的是只看到了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由專制淫威所壓榨成的馴服的奴隸性，却不能看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大眾自覺地奮起的可能性。

然而這樣的觀點對於魯迅這時期的思想已不是決定的因素，而只是表現於他的反封建傳統的實際戰鬥進行中的思想負累。但如果說這種負累對於戰鬥力的發揮沒有任何影響也是不對的。

像周作人那樣的人以爲，魯迅是「對於中國民族抱着一片黑暗的悲觀」，自然是極糊塗的看法。但魯

迅曾經——尤其在一九二五以後的幾年間，經歷着中國革命的大變化，曾流露出悲觀失望的情緒也是我們不必否認的。

魯迅從現實的生活經驗出發，赤裸裸地撕開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虛偽、卑劣、陰險、狠毒的面貌，以致使得他們的眼前——如用魯迅自己所說——『黑的惡鬼似的站着「魯迅」這兩個字』（兩地書）。但同時究因為他這時還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也就常常難免把統治者的罪惡和被統治的人民因黑暗的統治制度而染上的病態一起歸着於「國民性」的問題。『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一九二五年三月）——不看招牌要看貨色，這是戰鬥的現實主義，然而把「改革國民性」當做革命的前提，却正是以「形成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如果革命失敗就因為國民性沒有改造的原故，那麼，革命就會被看做是永遠連續的悲劇了：『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而已集，一九二七年九月）

悲觀失望的情緒却不能使他停止前進的脚步，這又是為什麼原故呢？

與唯心論觀點相對立着的，從實踐鬥爭中培養起來的現實主義的戰鬥精神起着偉大的抗毒素的作用。魯迅儘管是以小資產階級的進化論與個性論思想出發，但他從不用一套小資產階級思想構成一個小天地，使自已「安身立命」於其間。恰恰相反，他永遠是在突破這個思想圈套去和現實的社會鬥爭相接觸。魯迅的個性論是「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這和從個人出發的利己主義有着原則上的區別。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底曾如此說過：『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於弄弄筆墨的，却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爲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兩地書）而魯迅自己，不管在怎樣情況下，總是以誠摯的心情爲社會而工作，以致到了完全不顧到自己的地步。偉大的思想先驅者，有着他的最沉重的苦痛，這種苦痛之所以是沉重，就因為那並非出發於個人利害的計較，而是要追求怎樣才能爲社會的進步而工作得更好，工作得更有效。

與悲觀絕望相反的一種因素，在魯迅身上也是一路發展着的。一九二二年的「無題」中記載他因一個賣朱古律的店員基本上未失去誠實之心而感到「慚愧」，他說：『這種慚愧往往成爲我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着人類的希望』。（熱風）「吶喊」中的「一件小事」記載他從一個黃包車夫的行爲中得到深刻的感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魯迅就是這樣地常常從他與「卑微的小人物」的接觸中檢查他自己的思想。「墳」後記中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我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魯迅的自我批判，從不自欺的精神正是他能够從周圍現實中接受教訓的基因。三一八的犧牲者更使他奮然喊出：『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將更奮然而前行。』（華蓋集）——這時期他所能感到的希望縱然只是「微茫」的，「遠遠」的，然而這正是使他不啻「路漫漫其修遠兮」，但終不放棄「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基礎。

「野草」——這一散文詩的結集最深刻地表現着他在大革命過程中的悲觀、絕望、矛盾、憤慨和苦痛的追求的心情。他的悲觀是由於他所接觸到的革命現實恰恰與所希望的相反，他的苦痛是由於在四面「碰壁」之下發現他的舊的思想武器之衰朽。整個中國正沸騰在大矛盾，大分裂中，魯迅的苦痛是與整個時代相關連着的。這不是引導向退嬰萎縮的失敗主義者的心情，恰恰相反，倒是向前跨進更大一步的新生因素，雖然裏面包含着悲觀絕望的成分：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够通過大悲觀而走向真實的大希望，通過絕望而開始去學習『別種方法的戰鬥』。

★

在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一次演說中，魯迅指斥了那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投機取巧的小資產階級；他說：『這樣的翻着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

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A要變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于是就變成了B。……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却並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二心集」）

魯迅的思想有過「突變」麼？毫無疑問，應該肯定是有。但這突變不是所謂在「一天晚上」忽然奇蹟似地出現的。有了和封建舊勢力的長期搏鬥的經歷，從現實的鬥爭中認識到舊武器的無力與失效，我們的偉大先驅者經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後的大屠殺，大流血後，從苦痛和絕望交織的矛盾中，重新抬起頭來。魯迅開始了他從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轉向無產階級立場的轉變，他找到了新的真實的希望。一九二九年他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九三〇年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那正是「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條件一出現」，A就變成了B。

「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恨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却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一九三二年四月）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之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現在蘇聯的存在與成功，使我確切地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問，一九三四年）

『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遇到保守家們壓迫和陷害。大約十年之後，階級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